

继2013年的《被掩埋的巨人》之后,经过了七年的等待,我们终于又等来了日裔英国作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最新长篇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小说的背景可以说出人意料,但故事的内核却依然是一个典型的石黑式命题。归根结底,这个命题就是两个字——“人心”。

人心在“克拉拉之镜”中无所遁形

□宋金

乍一看来,这是一部有关未来社会与人工智能的小说。考虑到近年来人工智能所取得的突飞猛进,我们很容易将涉及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归入科幻小说的范畴。然而,熟悉石黑一雄的读者们都知道,无论他笔下的故事发生在怎样的时空背景之中,借用怎样的题材外壳(无论是科幻、奇幻还是侦探),其本质是一以贯之的。瑞典文学院在给石黑一雄的颁奖词中,曾对他创作主题做过一个精妙提炼,那就是:“记忆,时间与自我欺骗。”这部作品事实上也不例外,尽管这一回,石黑为我们上演了一次巧妙的变奏。

我们的主角,同时也是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者克拉拉是一位太阳能机器人AF(人工智能朋友)。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幕,我们才意识到,整个故事事实上是克拉拉在临近“生命”终点之时,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回顾——用她的话来说,是将她的一段段记忆在时间之轴上一一整理归位。变奏恰恰发生在第三个关键词——“自我欺骗”上。我们知道,机器人是不会说谎的,更何况克拉拉是一位专为陪伴人类而设计的机器人,具有极高的观察、推理与共情能力,还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同时,在回首往事的过程中,克拉拉始终怀着一个纯粹利他的动机,那就是反复拷问自己,她所作出的那个抉择,是否真的最有利于她全心全意陪伴着的少女乔西。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克拉拉的记忆是完全真实、可靠且诚实的——这与过去石黑笔下那些活在内心迷雾中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一次,我们在石黑的作品中遇到了一位可靠的叙述者。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自我欺骗”真的从这个故事中消失了。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克拉拉并非生活在一群同她一样实事求是的机器人中间,而是生活在人类中间。克拉拉那敏锐、客观又诚实的洞察就像是一面镜子,不动声色却又无比精准地映照出了乔西和她身边每一个人的内心。而人心,我们知道,既非完全诚实,也非完全利他。当这一颗颗心灵在克拉拉之镜中无所遁形时,我们看到的又是怎样的自我欺骗呢?

青梅竹马的乔西和里克日复一日地憧憬着一个共同的未来,一笔笔地勾勒着他们那美好的“计划”,仿佛那是一个命中注定、无可改变的预言,可他们并非不知道横亘在两人中间的阶层(甚至是基因)壁垒,绝非两个孩子单凭计划就能打破了的。里克的母亲海伦小姐一心想让没有接受过基因“提升”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同那些得到“提升”的聪明孩子一样拥有成功的人生,为此她竟然向自己年轻时曾经深深伤害过的那个男人寻求帮助,指望着他能捐弃前嫌,慷慨地对自己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伸出援手——她果真不知道,她是在用圣人的道德和心胸来要求一个血肉之躯的凡人吗?还有乔西的父亲,曾经的天才工程师,因为被人工智能“替代”而丢了工作,却一遍遍地坚称对自己的人生无怨无悔,坚称正是因为丢了工作,他才得以重新找回自我;可就在他对着曾经的妻子这般慷慨陈词的时候,就在他与爱女短暂的团聚时光一分一秒流逝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他为自己的“新生”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吗?

然而,最为深刻的一场自我欺骗,还是发生在乔西的母亲心中。这个女人,因为自己的

一个决定,失去了大女儿萨尔。而现在,她因为同样的决定,眼看又要失去二女儿乔西。萨尔那一次,她挺了过来;可这一次,她再也承受不了同样的打击了。这一次,就算是死亡也不能夺走她的女儿。她请求克拉拉,当那一天终于到来时,为了她而“延续乔西”。“为我延续乔西吧……而我也就能够爱你了。”当母亲在车中对着克拉拉说出这番话时,整个故事也终于达到了关键点与高潮。

与少女乔西朝夕相处的机器人克拉拉,真的能够凭借着远超人类的洞察与学习能力,学习乔西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乃至于她的全部内在人格,不是“复制”乔西,而是“成为”乔西,成为她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延续吗?对于这个近乎存在主义的问题,“延续”计划的操刀人卡帕尔迪先生、乔西的父亲保罗,还有我们的主角克拉拉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视角,给出了各自的解读。卡帕尔迪先生自称理性的信徒,坚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并没有什么独一无二、无可转移的东西,所谓的人心只是一个古老的修辞,一个等待着被科学和数学彻底粉碎的迷信。乔西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妻子和卡帕尔迪先生的计划,竭力想要找出AF无法洞悉人类全部奥秘的理由;他将人心比作一栋奇怪的房子,里面房间套着房间套着房间……无论克拉拉探访乔西的内心多少回,总有一个房间是她从未进入过的。克拉拉并不同意父亲的理由,但她却从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与父亲一样的结论,而她的视角显然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请求克拉拉延续乔西的并非乔西本人,而是她身边那些爱着她的人,而爱她爱得最为彻骨、最为忘我的,无疑是乔西的母亲。当她请求克拉拉为了她而延续乔西时,她指的并非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延续女儿,而是指在她的内心中;她在请求克拉拉在乔西离世之后,让她能够相信女儿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她在请求克拉拉帮助她欺骗自己,不是欺骗一时,也不是一日,一周,一年,而是漫漫的余生。然而,这可能吗?自我欺骗的最为悲哀之处并不在于它的虚幻,而是在于它的不可持久。它就像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泡泡,等待着现实的针头来将它戳破。现实越是残酷,悲剧越是沉痛,它破裂的速度也就越快。最终,无论克拉拉对乔西的“还原”有多么的逼真,她在本质上也不过是乔西的一尊遗像。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克拉拉才最终做出了那个她所认为的正确抉择。

当我们说到自我欺骗时,我们总是会将它与“逃避”“怯懦”“糊涂”等等负面的词汇联想在一起。但事实上,自我欺骗是我们能够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而不发疯的一个重要理由,对于人类的生存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自我欺骗的根源并非人心的虚妄,而是人心的脆弱;它是人心为自己筑起的一道简陋的缓冲,使我们不必迎头承受现实的全力一击,而是能够假以时间,渐渐地接受现实。克拉拉清楚这一点,因此她从不评判任何人。当她向她的神祇——太阳——默念出她的祷词时,她知道,仁慈的太阳也清楚这一点。太阳能够拨开那些虚幻的泡泡,那些善意的谎言,那些注定无法兑现的承诺,看到人心深处真正宝贵的东西。他会原谅我们的脆弱,成全那经受得住最终考验的东西。

(摘自自《克拉拉与太阳》译后记,有删节)

想象历史的N种方式

□刘仲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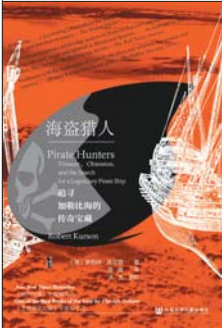
人是历史的存在物,我们通过理解历史而理解自身。历史与历史的叙述从来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历史早已湮没于岁月的风尘中,我们所知道、所了解的历史,都是后来者对历史的叙述,即“历史叙事”。既然是叙事,它就天然地蕴含了故事性和文学性。反过来说,作为人学的文学,其实是记录历史最生动、最鲜活的载体,是历史叙事的最佳体裁。历史是客观的,但是对历史的叙事从来都带有叙述者的前理解,更因不同的叙述意图而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因此历史叙事一直是文学创作的“富矿”。在二十世纪后期海峡两岸新生代作家的历史叙事中,这种丰富性和异质性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的“新生代”,主要是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九十年代中期成名于中国文坛的一批小说家,如毕飞宇、邱华栋、朱文、李洱、吴晨骏、东西、徐坤、陈染、林白、朱文颖等人,他们因书写的个人化风格而为人们所熟知。海峡对岸的台湾文学“新生代”(又称“新世代”),时间上要稍早于大陆。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出生,八九十年代成名于台湾文坛的作家群体,如黄凡、张大春、东年、王幼华、平路、李昂、陈烨、朱天心、朱天文、简嫔、林清玄等人。两岸新生代作家虽然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很大差异,但是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相似的社会经历,又都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市场经济和都市文化的洗礼,因此在面对历史进行想象的时候,两者又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如都追求解构色彩的文学叙事和美学理想,在精神气质和创作取向上主动追求与前辈作家“断裂”。历史在他们笔下,只是一个自由表达个人审美理想的道具、一片无拘无束挥洒个人才情的园地。他们的叙事法则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新历史主义”是两岸新生代作家的共同标

海盗版“月亮与六便士”

□乐倚萍

《海盗猎人:追寻加勒比海的传奇宝藏》一书,光听书名,就足以挑起读者阅读兴趣。更何况,其中还穿插了传奇海盗船长班尼斯特与他的金羊毛号的故事。连见多了沉船的书主人公——两位海盗猎人——都对之亢奋不已。



《海盗猎人:追寻加勒比海的传奇宝藏》
[美]罗伯特·库尔森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故事始于17世纪,大名鼎鼎的约瑟夫·班尼斯特曾是一位英国船长,经验丰富、口碑良好、受人尊重。然而有一天,他突然监守自盗,偷走了“金羊毛号”,开启了海盗生涯,甚至以寡敌众战胜了缉捕他的皇家战舰。金羊毛号也在此役后沉入海底,班尼斯特成功脱逃。班尼斯特为何放弃社会地位和优渥收入,要去铤而走险当海盗呢?人们越是难以理解他的动机,他的故事就越有吸引力。

200多年后,以发现沉船宝藏为业的海盗猎人查特顿和马特拉得知了班尼斯特的故事,随之而来的是一项委托:寻找金羊毛号的下落。他们有打捞沉船的热情,也有设备和技术,按说是令人羡慕的“事业即兴趣”。但当时两人亦颇有顾虑:查特顿和马特拉已经规划好了要去打捞一艘相对有把握的沉船,他们几乎是倾其所有购买了装备,沉船上的宝藏令人期待。相比之下,班尼斯特弃下的金羊毛号线索有限,试图搜寻它的前人都无功而返,找到的希望渺茫不说,船上也未必有珍宝可报偿他们的付出。选择这项委

签。同时,近年来华人作家的历史叙事已成为全球汉语写作和研究的热点之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综观国内外的现状,上述课题大多局限于各地汉语文学板块(如东亚、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的内部区域性研究,跨地域、跨文化的华人新生代历史叙事比较研究总体较少。基于以上原因,山东师范大学张琴凤教授所著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新生代作家历史叙事比较研究》,以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生代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对两岸新生代作家的历史叙事进行多元比较研究,可以说恰当时。

张著以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代际学、文化场域、身份批评等多元理论为依托,基于跨文化、跨地域的整合视角,首次构建了两岸新生代作家“历史叙事”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结构严谨,逻辑清晰。主要内容涵盖探源“新生代”概念,系统梳理大陆和台湾新生代作家的命名过程;解读“历史叙事”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比较阐释两岸新生代作家历史叙事的文化品格,比较分析两岸新生代历史叙事的多元形态策略。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不仅呈现了两岸新生代作家历史书写的生机活力,也关注其面临的共同困境难题,由此反映出两岸新生代历史叙事的整体发展态势,揭示了其历史叙事内涵品格和形态策略的深层特质。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里隐藏着一个民族既往历史的全部密码,携带着决定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全部基因。作为同样用汉语言写作的文本,当代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是中华文化母体上绽放的双生花,并蒂莲。正如张著所指出,两岸新生代作家通过同中有异的个人化历史叙事,揭示了个体自由的历史叙事伦理,肯定了基于民族共同记忆的历史叙事的意义价值,实现了中国文学在新世纪跨地域的叙事整合,以文学的方式论证了作为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中华文明的整一性和合法性。

托,无异于押上身家的豪赌。倘使两人更年轻,或可视其为理想挑战一把,然而时间不等人,查特顿和马特拉作为水肺潜水员已属“高龄”,另一厢,他们还要跟立法时间赛跑——已经有许多国家呼吁,私人打捞不合法,要求将打捞所得归属国家——或早或迟,海盗猎人的行为将被叫停。

纵使如此权衡,两人的选择却如班尼斯特的选择一样令人诧异。“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旁人能想到的现实考量他们不是不明白,对他人而言可有可无的向往反而让人放不下。班尼斯特的故事不容错过,何况,除了查特顿和马特拉,还有谁更有希望找到金羊毛号呢?

搜寻沉船既需智慧,又需体能。首先,查特顿和马特拉根据委托人给的线索和文献记载,划定了大致的地理方位。时隔太久,线索暧昧不明,如何取舍有时也要借助这一行的直觉。譬如,大多数海盗猎人执着力于利凡塔多岛,在此逡巡无果。但是仔细阅读历史记载,逃亡途中的班尼斯特是在给金羊毛号侧倾修缮时遭到攻击的,沉船的海域应当既隐蔽,又适合船只侧倾,查特顿和马特拉据此大胆排除了利凡塔多岛沿岸大片海域。缩小范围后,借助磁力仪探寻水下的金属物质,一旦出现可能,就要潜入水下一探究竟。找到的物品或许非常脆弱,取出样品、作出判断,有如鉴宝,颇具专业性。一路伴随查特顿和马特拉的足迹,且败且战,愈挫愈勇,读者恐怕也会渐渐放下不能找到宝藏致富的担忧,理解他们的热切。

当我们暂时抛开道德与否着迷于海盗的传奇,当我们一步一步沉浸在海盗猎人的世界里,当我们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短暂触动时,我们也在仰望月光,只是随即无奈与之分道扬镳。